

戰後臺灣

歷史閱覽

自一九四九年起至二〇〇〇年止，
這漫長歷史長河所帶來的究竟是怎樣的一段故事？
打開歲月的黑盒子，拾起一片片的記憶，
細說臺灣二十世紀的下半葉。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薛化元 著

臺灣史

戰後臺灣歷史閱覽

薛化元◎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後臺灣歷史閱覽／薛化元著．--初版--．--臺

北市：五南，2010.03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78-957-11-5910-2（平裝）

1.臺灣光復 2.臺灣史

733.29

99001484



1WE8

戰後臺灣歷史閱覽

作 者 — 薛化元(432.5)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龐君豪

主 編 — 盧宜穗

責任編輯 — 陳姿穎 許經緯

封面設計 — 童安安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0年3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500元

作者序

這本書取名爲《戰後臺灣歷史閱覽》，與我寫作的初衷有關。在本書中希望對選取的臺灣政治、經濟、社會之重大事件，做簡短的說明，使得未曾親歷那一段歷史的朋友，得以一窺當時事件的梗概。不過，這件工作的開頭，則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還就讀碩士班，深爲臺灣沒有本土編纂的歷史年表感到遺憾，也是我後來長期投入主編臺灣歷史年表的緣起。可是，編歷史年表是件大工程，不是我短期可能完成的。因而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我開始想要先針對戰後臺灣歷史的重大事件進行分析、導讀。

當初之所以有園地，得以針對戰後臺灣歷史的重大事件進行分析、導讀，是已故顧紹昌先生的支持。當時我根據日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編的年表，依時序篩選出戰後臺灣的重大歷史事件，再進行導讀的寫作。不過，由於我研究所畢業入伍，因此只寫到戰後初期便告一段落。而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一九九〇年代初，恰巧當時國策中心葉國興副執行長的提議與支持，我把原本和朋友利用假日在圖書館翻報紙編年表的工作，移到國策中心（國策研究院的前身）。以後在李永熾老師的主持下，帶領團隊成員，前前後後編輯出版了五冊戰後臺灣歷史年表。可惜，根據原本計畫要編輯日治時代一八九五年以來到二〇〇〇年的歷史年表計畫（最初的計畫是準備編到一九八八年），始終沒有機會完成，而日治時期一八九五至一九二〇年的年表初稿，也在當年汐止東科大樓的那一場火警中燒毀，包括當時存在國策研究院不同電腦，以防萬一的備份，也無一倖存。

而在開始進行戰後臺灣歷史年表編纂工作的時候，我自己也開始繼續入伍前戰後臺灣的重大歷史事件導

讀的寫作。只是當時也是零零星星的寫著，斷簡難成篇，後來因為老包（詹錫奎）辦《新臺灣週刊》，我有機會每週撰寫歷史一週的戰後臺灣史大事紀，才讓這本書的雛形慢慢浮現。而後，在助理、學生的協助下，這書稿也一再增補、校讀。直到我在臺灣歷史學會主持「戰後臺灣重大歷史事件」計畫，全書的形貌才大致底定。我今年七月底結束七年擔任主管的歲月，重新整理研究室，還找到十多年前寫作的初稿和寫作準備的檔案。拿來和成書內容以及目前放在書架上的相關檔案比對，差異頗大。這也難怪，當初開始協助我校對初稿的林果顯，還是一位大學生，現在他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並正式在大學任教了，歲月確實在這本書稿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開始在《新臺灣週刊》寫作時，雖然有《戰後歷史年表》做基礎，但是挑選大事紀、蒐集相關的報導和史料仍是件大工程。當時，協助我建立大事紀資料庫，選取撰寫導讀條目及影印資料的，主要是史薏平。而我從交通大學轉到政治大學任教後，則是在曾婉玲的協助下，開始整理初稿，包括重複內容的統整以及下標題。而在這本書內容寫作的過程中，還有好幾位助理、學生的協助，在此要特別感謝他們，那就是林果顯、楊秀菁和林忠蔚。特別是林果顯，這本書的書稿前後校讀了多年、多次，最後也在他校對後完稿。

從內容上看，和初稿相比除了內容增加許多外，原本初稿只選擇發生在臺灣的大事，本書則增加了一些不是在臺灣發生，卻影響臺灣十分深遠的重大國際事件。如：韓戰爆發後，杜魯門總統發表了「臺灣海峽中立化宣言」；一九七一年嚴重影響臺灣國際舞臺空間的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等等。而為了方便閱讀者可以了解內容的出處，以進一步了解或是查閱，每一條目的後面都附加了主要的參考資料。而在書的體例上，則根據時間先後加以排序，書後則附條目檢索，方便讀者使用。而和一般學術性著作不同，這本書固然有其學術性，但主要是記錄我自己成長以及呈現我對戰後臺灣歷史解釋觀點，因此並沒有逐一詳加注釋，僅

附上寫作時主要的史料來源。當然，本書的許多觀點是來自筆者過去研習所得，這應該對先行的研究者表達謝意。

我原本計畫自己出版這本斷斷續續寫了多年，伴隨我從學生時代到教授升等的書。碰巧五南出版社的盧宜穗小姐來催我延宕多時的戰後臺灣史書稿，結果相談之後，決定出版這本書。盧小姐曾經建議把內容增補到二〇〇八年，可是我基於原本編纂歷史年表就準備編到二〇〇〇年，而這一年又是一個世紀的結束與戰後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因此就維持原來的構想，至於以後的發展如有機會再另外補充。當然，如果沒有盧小姐再三以可能無法如期出版施壓，在我每天都想修正、增補的意念下，這本書恐怕很難順利出版，她應該是這本書最後的催生者。

薛化元

二〇〇九年九月五日

導論

戰後臺灣史發展的一個軌跡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結束了隸屬於中國的時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更發布了所謂的「開羅宣言」。雖然「開羅宣言」並不是國際法上的條約，沒有領土轉移的國際法效力，但是它在現實國際政治上則有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宣告了當時主要盟國對戰後政治安排的取向：國民政府取得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支持，在戰後取得臺灣。在此背景下，國民政府在開羅會議後，先後成立了臺灣調查委員會，草擬了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而於德國投降之後，在美國總統杜魯門代為簽署的狀況下，邱吉爾及蔣介石和他發表了「波茨坦宣言」。日本天皇則在美國於廣島、長崎投擲兩顆原子彈之後，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透過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向日本國內宣告投降的訊息。日本投降後，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旋即發布第一號命令，而根據第一號命令，便由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派的代表陳儀負責接收臺灣。

就這樣，在絕大多數臺灣人民沒有如同朝鮮人民要求當家作主之際，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陳儀正式接收臺灣，揭開了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的序幕。雖然，就現實政治而言，此後臺灣即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下，不過，在國際法上對此一事件的意義仍有不同說法。縱使是在國民黨馬英九政府下，總統府舉行的展覽，也明白提出中華民國政府是在一九五二年生效的舊金山和約和臺北和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和平條約）下，才取得臺灣的領有權。更不用提，自一九四五年以後，根據國際法主張臺灣地位未定論（特別是在舊金山和約之後），或是認為臺灣主權應該歸屬臺灣人民（住民）的主張。而戰後臺灣的歷史，也就在此一國際

地位錯綜複雜的狀況下展開。

換言之，臺灣的國際地位在國際法上雖有相當的討論空間，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政府）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已經用其國內法長期統治臺灣。從中國引進的制度、文化，在政治的強勢下成為主流，這是戰後臺灣歷史「橫的移植」的一面。就此側面而言，當然還有以後主要受美國影響，導入的歐美文化。不過，原本臺灣的本土傳承，包括日治時期的制度以及文化發展成果，雖然相對弱勢，卻仍是臺灣歷史「縱的繼承」的展現。

戰後臺灣史的關鍵年代及其意義

基本上，戰後臺灣的歷史，可以一九四九、一九七二及一九八七年三個關鍵年代作為四個時期的分界。首先，雖然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接收臺灣，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被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繼承，但是整個政府統治的主體在中國大陸，臺灣基本上只是相當邊陲的統治區域而已。可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黨當局在國共內戰遭到嚴重挫敗，中華民國政府敗逃臺灣以後，臺灣已經成為其統治的重心，整個中華民國國家（政府）主要就存立在臺、澎、金、馬。中華民國的發展，在現實政治上與臺灣密不可分。

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統治的正當性論述，直到一九九〇年代進行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的政治改革之前，則主要有兩個基礎：以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居，在此架構下，以中共（共匪）叛亂，

「竊據大陸」爲由，實施動員戡亂和戒嚴，並凍結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排除了透過選舉政黨輪替的可能；另一方面則維持形式上的「憲政體制」，並以行政命令推動地方選舉，試圖對外建構「自由中國」的形象。而當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相對穩定之際，國民黨對臺灣的內部改革，進展相當有限。

相對地，當中華民國政府的外部正當性面臨強大挑戰，如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後，爲了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國民黨當局便推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制度，補強「萬年國會」欠缺的臺灣民意基礎。就在此時，蔣經國於一九七二年五月成爲行政院長，完成了行政體系的接班工作。由於蔣介石晚年身體欠佳，在某種意義上蔣經國已經成爲實際的國家領導人，直到一九八八年初過世爲止。蔣經國接班以後，雖然陸續在黨政部門拔擢一些臺籍菁英進入中央，推動經濟建設，進行一般稱爲「革新保臺」的路線，但基本上仍維持強人威權統治。

而在蔣經國執政晚年，一方面必須面對國內以黨外人士爲主，要求政治改革的力量；一方面在國際局勢不利的狀況下，又必須面對美國方面要求改革的壓力，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統一的「統戰」。蔣經國權衡國內外的情勢，選擇了抗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戰的政策，最後並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旋即在一九八八年一月正式解除報禁，邁出了自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並在其後接任國民黨主席。而在政治權力稍微穩固後，李登輝開始進一步推動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國會全面改選、地方自治法制化，並在一九九六年成爲第一位公民直選產生的總統。次年，在「自由之家」的評比中，臺灣成爲完全自由國家。而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更被視爲臺灣民主制度進一步穩定發展的里程碑。

由於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前，臺灣基本是在強人威權體制的統治下，所以下擬簡單說明強人威權體制的

發展，以及臺灣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的歷史軌跡。

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強人威權體制的發展

根據一般說法，往往認為蔣介石總統主政的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中，一九五〇年代軍事統治的色彩較為濃烈，而一九六〇年代以降則較為注重經濟發展，而呈現「開發獨裁」的特色。但是，從具體事證來看，前述說法仍有斟酌的餘地。

一九五〇年三月原本自己下野的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重新擔任總統。而在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執行臺灣海峽中立化政策，使臺灣免於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威脅之後，兼任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開始推動國民黨的改造。透過改造，他排除了原本主導國民黨組織的C.C.派，直接掌控了黨機器，並完成了在中國大陸訓政時期都沒有完成的「理想」——以黨領政、以黨領軍。在他的主導下，國民黨政權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發展，排除了黨政體系中反對此一政治路線的吳國楨、王世杰、孫立人等人。而在一九六〇年為了蔣介石總統三連任，才正式透過修憲程序，以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方式，凍結憲法有關總統只能連任一次的規定。此舉使蔣介石得以連任成為終身職的總統，強化、鞏固了由他（以及其後繼者蔣經國）主導的政權。

換言之，國民黨當局直到一九五九年為止，仍形式上維持自中國大陸帶來的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不變動。而輿論雖然遭到有關當局的打壓，在野的政論雜誌或是報紙仍勉強有一定的空間。「白色恐怖」的壓力沉

重，甚至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之際，仍可聽到、看到在野聲音與結合的努力。

不過，伴隨著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打壓，一九六〇年九月逮捕雷震，不僅使黨禁浮上檯面，也迫使《自由中國》停刊。次年，更透過形式上的政治及司法運作，迫使李萬居失去他一手創立主導的《公論報》，臺灣不僅進入了正式的黨禁時期，而且也失去了類似《自由中國》這種政論雜誌，或是由在野派掌控的報紙，一九六〇年代變成了在政治領域上噤聲的時代。不僅如此，原本由文人擔任的臺灣省主席一職，一九五七年八月周至柔接替嚴家淦後，開始由軍人擔任，此後，一九六二年的黃杰、一九六九年的陳大慶相繼接任，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謝東閔被任命為止。在此期間，臺灣省政的範疇內，軍人主政的色彩反而較之前濃厚。

「革新保臺」與強人威權體制

如前所述，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做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形象與論述，在國際社會遭到挫敗，甚至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主張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已經成為以聯合國為首之國際社會的共識。不僅中華民國的外交出現嚴重危機，臺灣也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企圖的威脅。而蔣經國一九七二年接任行政院長後，則展開所謂「革新保臺」的政治路線。

蔣經國內閣人事中，副院長徐慶鐘、內政部長林金生、交通部長高玉樹、政務委員李登輝等人，還有新任的臺灣省主席謝東閔皆屬臺籍。其中行政院副院長、交通部長和臺灣省主席都是第一次由臺籍菁英出任。

而在國民黨內也拔擢臺籍菁英，進入中央服務。由於臺籍菁英進入中央黨政體系服務的人數較過去增加，一時有所謂「吹臺青」的說法。而定期舉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也使臺籍菁英可以透過選舉（不一定需要高層關愛的眼神）進入中央政壇，民意也開始可以多少透過選舉在中央發聲。

不過在蔣經國主政期間的所謂「本土化」路線，雖拔擢部分臺灣籍的「青年才俊」擔任黨政幹部，但是國防、經濟、財政、情治、外交乃至中央教育主管的職位，仍由老一輩來自中國大陸（或其下一代）的「外省籍」黨國菁英擔任。至於國會運作，也仍然是在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掌控下。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之後，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部分，臺籍菁英的數量是有明顯增加。然而，現實運作上，在蔣經國主政期間，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不僅名位來自蔣經國主席的欽點，中常會的實際運作上也以其意志為依歸，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相對蔣經國主政的政治路線，來自民間的改革聲音也逐漸發展，黨外人士透過選舉活動、出版，持續發聲。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一九七〇年代面對臺灣的國際生存危機，更陸續通過以臺灣作為政治主體，以及關心臺灣前途和政治改革的三個宣言。另外，在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本土語言、文化逐漸復甦，不久，鄉土文學運動更是蓬勃發展。不過，國民黨當局對此一發展，則採取打壓的政策。在語言、文化方面限制本土語言的使用及戲劇、歌曲廣播電視播出時段與次數。甚至進入教會，沒收本土語言文字（包括福佬、原住民等各種語言）印行的聖經。至於鄉土文學論戰，也曾經出現肅殺的氣氛。而在政治方面，對於黨外人士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也採取壓制的態度，而發生了「美麗島事件」。雖然 Edwin A. Winckler 認為相較於蔣介石統治時代的「硬式威權」，蔣經國時代已經是「軟式威權」，不過直到此時為止，強人威權體制仍未鬆動，甚至對臺灣本土意識和文化的打壓，還有強化的現象。

另一方面，以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規劃的重大建設為基礎，集中在此一時期陸續完成的所謂「十大建設」，則是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建設，對臺灣以後的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而經濟發展，也是此一時期國民黨當局宣傳的重點之一。

至於強人威權體制的鬆動，以及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則是蔣經國主政晚期的作為，特別是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推動的。其中最受矚目的，包括解除臺灣為期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開放報禁。而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在國家公權力作為上，是臺灣人民前往中國大陸的開端，以後陸續擴大開放，對此後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強人威權體制的鬆動與政治改革

如前所述，一九七〇年臺灣在國際舞臺遭到嚴重挫敗之後，臺灣本土也逐漸興起一股文化運動，包括校園民歌的興起、鄉土文學論戰等等，帶動了臺灣本土社會文化思潮。而在同一時間，雖然蔣經國已經接班，但是政治鎮壓的案件仍然此起彼落，特別是當反對運動與威權體制出現摩擦之際，往往便造成重大之政治案件。包括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中華民國斷交（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之後爆發的余登發事件、同年的美麗島事件，以及次年的林義雄滅門血案，而為了壓制海外批判的聲音，在一九八一年爆發了陳文成事件。一九八四年，更由於軍事情報局派遣竹聯幫分子赴美暗殺江南，引發了國際矚目的「江南案」。

當中華民國政府國際生存空間遭到打壓，國際情勢越趨不利的情況下，也出現有利於臺灣政治改革的氛圍。原本美國在戰略利益考量下，雖然關心臺灣的自由民主發展，卻也擔心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後，國民黨可能失去政權，而臺灣不再配合美國的政策。可是當美國轉而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希望取得中共當局的支持牽制蘇聯時，臺灣的戰略地位已經下降。相對地，在新興海外臺灣人團體的遊說，以及對臺灣友善的美國政治人物推動下，美國對臺灣推動政治改革的問題，轉趨積極。在這樣的背景下，配合美國在一九七九年制定臺灣關係法之後，即持續對於臺灣自由、民主的發展，密切關注，對國民黨當局造成了政治改革的外部壓力；加上來自臺灣內部要求自由民主改革的力量逐漸茁壯，成為國民黨當局政治改革的內部壓力。蔣經國總統權衡內外情勢，採取了爭取美國支援、持續反共、推動政治改革的路線。除了宣布蔣家人不會再擔任下一任中華民國總統外，更決定採取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報禁等措施。強人威權體制已然鬆動，即將在政治改革持續進展下崩解。

朝向自由國家發展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以後，中華民國仍然處於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化雖有進展，但仍未完成。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之後，旋即開始推動進一步的政治改革。首先，先終止動員戡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更因為當時引發的獨臺會事件，進而在要求改革的聲浪中，先廢除了「懲治叛亂條例」；第二年更在民意的壓力下，修正了刑法一百條，結束了「言論叛亂」的時代，白色恐怖也正式成為歷史。而

目次

作者序 3

導論 9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 19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 69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七年 239

一九八八年到二〇〇〇年 339

索引 459